

「日本中國學的開展」導言

連清吉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891)傳《隋書經籍志》著錄中國傳入日本典籍，聖德太子(574-622)援引《五經》、《孝經》、《論語》、《諸子》及《文選》文辭，撰述〈十七條憲法〉。奈良(710-784)、平安時代(794-1192)以來，六朝駢文、唐代詩文流行於王室貴族。鎌倉時代(1192-1333)中日禪僧往來，以五山為中心的禪林文學鼎盛，漢學受容也有由經學、漢唐經傳注疏轉趨《四書》、宋代程朱理學的機兆。德川家康開府，江戶時代(1603-1866)二百六十多年間，以儒學為主流而朱子學、陽明學、考證學相繼專擅，學者輩出，皆以漢文為抒情言志，注疏經傳子史，論辨義理。林家朱子學既是日本近世的先聲，又是日本近世學術的主流，而京都伊藤仁齋的古義學，大阪中井履軒與筑前(今福岡縣)龜井昭陽的經學，大阪富永仲基的「加上說」，杵築(今大分縣)三浦梅園與日出(今大分縣)帆足萬里的「窮理學」與「條理學」則有獨特見地的學問。

明治時期(1867-1910)井上哲次郎的《倫理彙編》與《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等三部著作是日本近代融合西洋學問而樹立「日本的」學問的啟蒙之作。東京大學漢學科、古典講習科的學者繼承江戶儒學，雖西風強勢，全盤歐化而斯文不墜，服部宇之吉總編輯《漢文大系》是綜合日中學問，集結碩儒耆老解題而顯揚江戶漢學的代表作。大正、昭和年間以西田幾多郎(1870-1945)為中心的京都大學哲學研究室的西洋，特別是德國哲學的研究，則以「西田哲學」而知名於西洋哲學研究界。

明治 30 年代以至昭和(1926-1988)前期，京都大學的狩野直喜繼承太田錦城、海保漁村、島田篁村一派的考證學，潛心於清代乾嘉的學術與清朝的制度。內藤湖南則是遠紹章學誠、錢大昕的學問宗尚，以史學的角度綜觀中國的學術發展。京都中國學的二祖(內藤湖南、狩野直喜)三宗(武內義雄、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四大家(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兒、貝塚茂樹、小川環樹)，頭角崢嶸，隱然為日本近代中國學的中心，又縱眼於世界漢學，成就京都中國學，與北京、巴黎並稱世界三大漢學中心。

日本的中國學研究雖然是中國的歧出旁支，但別系為宗，東洋學淵源流長，既認同以中國為中心的漢字儒學文化，又確立「受容→選別→融合→創新」之日本文化主體性。今日的中國學研究若立足於大中華文化圈，既愛歐美亦不薄東瀛的多元視座，取捨融合，或能有突破性的新開展。

本集專題所刊載的三篇論文，或以〈中庸〉為主題，通觀日本近代中國學的沿革，或綜述京都中國文學研究者的成就，或專論京都中國文學集大成者的中國文學方法論。

〈「建構體系」與「文獻解構」之間：近代日本學者之〈中庸〉思想研究〉就近一百四十多年來日本學者研究〈中庸〉文獻和思想之主要脈絡與觀點，提出有〈中庸〉本文和其在古代中國思想史中的意義，〈中庸〉之於宋明理學發展的關鍵角色，日本傳統知識份子對〈中庸〉的註解和理解，〈中庸〉對日本思想之影響等四個主題。綜觀日本〈中庸〉的研究，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1867-1900）出版了許多有關〈中庸〉的註解。第二階段（1900-1922）東京帝國大學漢學家以比較哲學的觀點來探討〈中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意義。第三階段（1922-1950）武內義雄等京都「支那學派」以「文獻學研究」方法開始進入〈中庸〉研究的核心。第四階段（1950-1998）：繼承武內疑古觀點，主張〈中庸〉的編輯時期基本上被認定於戰國最末年，或晚於秦漢時代，強調〈中庸〉思想的意義在於提供了秦漢帝國的統治某種大一統的原則。第五階段（1998-迄今）：由於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的出土，先秦思想史的研究進入了面臨重新建構的時代。重新思考〈中庸〉代表先秦中期以前的思想的可能性。

綜括近代日本學者〈中庸〉研究的成果，具有六項特色。第一，明治維新之後，由於西方哲學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之全面性引進，日本學者以東西比較哲學的觀點與方法，試圖闡述及建構〈中庸〉思想的體系。第二，在昭和初期，將〈中庸〉的「誠」作為日本國民的道德精神之核心價值來宣傳。第三，隨著近代文獻考據方法的崛起，繼承南宋王柏以來將〈中庸〉本文分成新舊兩個部分，主要經過兩階段而發展出現本的〈中庸〉的看法。第四，在二次大戰後，將〈中庸〉本文分成新舊兩個部分的想法成為了「主流」。在1940年代後，重澤俊郎、金谷治、島森哲男等的研究進一步發展此觀點。第五，除將〈中庸〉本文分成新舊兩個部分的想法之外，津田左右吉將〈中庸〉視為不同來源思想之混合，甚至認為〈中庸〉未有一貫的思想脈絡。第六，雖然接受〈中庸〉是由兩種文獻的組合，或含有不同思

想因素且經過不同階段發展之文獻，仍有一群學者努力在整本〈中庸〉中看出一貫通的思想脈絡，或作者撰作此書的「意圖」。

作者最後強調無論將〈中庸〉思想看做統貫的、或混合的，還是認為其成書時期應該是戰國、或秦漢時期，日本學者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從何種立場來探討，都能夠提供許多值得省思的材料和洞見。

〈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指出開創敦煌學的研究領域是京都中國學的重要學術貢獻，與北京，巴黎並稱世界三大漢學中心之所在。進而強調西方漢學重視戲曲小說的研究，王國維亡命京都，狩野直喜、青木正兒等人潛心於戲曲小說，形成風氣，因此，雜劇和戲曲的研究是日本大正到昭和前期，中國文學研究的顯學。至於青木正兒、本田成之、小島祐馬出版《支那學》，不但日本學者發表代表性論文，中國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吳虞、郭沫若、張爾田等人的論著也先後刊載，是中日近代學術交流的重要文獻。再者，中國文學理論的研究，也是京都中國學者的代表性論著。如鈴木虎雄是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先驅，其《支那詩論史》不但被譯為中文，以《中國古代文藝史論》上下（孫俚工譯，上海：北新書局，1928-1929年）的書名出版。中國第一部中國文學理論史著作《中國文學批評史》（陳鐘凡著，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的參考書目中也列有此書，顯示了其在此領域的先驅意義。青木正兒除了博士論文《支那近世戲曲史》之外，《支那文學思想史》（岩波書店，1943年）是繼鈴木虎雄《支那詩論史》以後的重要著作，《支那文學思想史》以通時的視角，對各個時代進行考察，全面敘述了中國文學思想。在書的外編，還收錄了有關書畫音樂等藝術思想的概說。而倉石武四郎近代語言學的研究則是在清代小學的基礎上所開展的新視域的研究。倉石運用精密的文獻學方法和自己豐富的中國古代語言知識，建立了注重歷史實證的中國古典研究。作為一個語言學者，他具有從中國古代語言到現代北京語以及各地方言的廣博學識，以辭書編纂和漢語教育為主，在許多領域為日本的中國語學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研究方法論〉首先揭示吉川中國文學研究之內涵，主要有精神史研究與內在本質研究之雙重特質。前者主要聚焦於吉川的元雜劇研究與《尚書正義》研究，吉川在元雜劇的研究中，強調中國士人因受到蒙古人的強烈統治，精神遂產生變革，進而促成其生活倫理與文學倫理的轉變。至於經學研究，吉川也從精神史之表現面向進行探討，而主張《尚書正義》所表述的思想主張是「決定的運命論」（天生命定論）

的思維，此一思維異於中國傳統之性善論，乃反應出六朝至唐初所謂人受命運左右而有諸多命限的思維方式。至於後者，則就吉川對陶淵明和杜甫的研究進行考察。吉川對陶淵明的文學性探究，主要是以「向內集中」與「外部擴張」的視域，結合時代動向與詩人個人之出處進退，詳密分析詩文涵義為基礎，探究詩人心境。亦即文學作品藉由研究者的代替作者從事深入感受作品文字，亦即以意逆志，再配合知人論世的考察再現作者之時代背景與人生舞臺，對研究對象展開全面性考索。至於杜詩的分析，吉川以為杜詩有「緻密」和「飛躍」兩個方向，並結合陸機〈文賦〉所謂：「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文學理念，主張詩以「飛躍」為圓熟；賦以「緻密」為極致，緣情「飛躍」要有緻密的「體物」才能完備，「體物」緻密要有超越的「緣情」才能圓足。杜詩的文字由離心發散轉為向心凝集，而詩意境界則由體物工微轉為體悟人生，此乃杜詩的特色，也是中國古典詩賦創作的方法。